

家业两全以安亲心： 子女成家立业对父母主观福祉的影响研究*

李 明¹ 张春泥^{1,2}

(1. 北京大学 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北京 100871; 2. 北京大学 社会学系, 北京 100871)

关键词: 成家立业; 主观福祉; 生命关联性; 代际关系; 性别差异

摘 要: “成家立业”是个体人生中向成年过渡的重要标志。在中国的情境下, 类似的人生事件不仅关乎个体福祉, 还对父母福祉产生代际影响, 这体现了生命历程理论中的“生命关联性”原理。本文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 研究青年子女成家立业状态对父母主观福祉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 既成家又立业的子女显著提升了父母的生活满意度, 但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 儿子成家立业的正向效应强于女儿; 同时, 儿子成年过渡的不完整性也更能降低其父母的生活满意度。机制分析显示, 拥有“成家立业型”儿子的父母在养老照料预期上更为积极、亲子关系评价更高, 进而能够提升其生活满意度。相较之下, 有“事业导向型”(已“立业”但未“成家”)或“未婚待业型”(未“立业”且未“成家”)儿子的父母在获得养老照料预期上更加悲观、亲子关系评价更低, 进而导致其生活满意度较低。本文强调了成年过渡期的整体性视角, 揭示了青年生命历程转型对父母主观福祉的代际溢出效应及其性别差异, 丰富了生命历程理论视角下的主观福祉研究, 也希望对思考当下国内家庭代际关系有所启发。

中图分类号: C913.68

文献标识: A

文章编号: 1004-2563(2026)00-0064-17

The Effects of Adult Children's Marital and Employment Status on Par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LI Ming¹ ZHANG Chun-ni^{1,2}

(1. Institute of Social Science Surve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2. Department of Sociology, Peking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1, China)

Key Words: “Getting married and developing a career,” subjective well-being, linked lives, intergenerational relationship, gender difference

Abstract: “Getting married and developing a career (*cheng jia li ye*)” are critical milestones in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in Chinese culture. These events affect not only individuals' well-being but also exert intergenerational influences on the well-being of their parents, exemplifying the “linked lives” principle in the life-course theory. Using data from the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

作者简介: 1. 李明(1995-), 男, 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博士后、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 社会分层与流动、家庭社会学。2. 张春泥(1985-), 女,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长聘副教授。研究方向: 社会分层与流动、家庭社会学。

* **基金项目:**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78批面上资助项目“数智转型时期青年‘学校—工作’过渡模式及其分化机制研究”(项目编号: 2025M782525)的阶段性成果。

this paper examines how adult children's marital and employment transitions influence their parents' subjective well-being and the mechanisms involved. The findings show that parents' life satisfaction increases significantly when children complete both transitions. Gender differences are notable: sons' successful transitions have a stronger positive impact than daughters', and sons' failure to achieve these milestones has a more negative effect on parents' life satisfaction. Mediation analyses reveal that parents of sons who complete both transitions have more optimistic expectations of future old-age support and report better parent-child relationships, boosting life satisfaction. Conversely, parents of unmarried or unemployed sons tend to have a pessimistic outlook and poorer relationships, lowering life satisfaction. This study highlights a holistic perspective on adulthood transitions and the intergenerational influences and gendered effects of adult children's life-course transitions on parents' perceptions of well-being. The results contribute empirical evidence to the life-course theory and offer valuable insights into intergenerational family dynamics in China.

一、引言

向成年过渡(transition to adulthood)是个体在生命历程中通过完成教育、参加工作、组建家庭等制度化生命事件,逐步建构并获得成年角色所要求的权利、责任与社会地位的过程。西方学界较早关注现代化进程对青年生命历程模式的深刻重塑^[1]。随着技术革新、教育扩张和就业结构转型的推进,青年向成年过渡阶段的生命时间表被系统性地重构;成年过渡期不断延长,就业、结婚和生育等关键事件的完成时间显著推迟,事件之间的时间间隔不断拉大^[2]。与此同时,生命事件之间原有的制度性关联逐步弱化,“上学—工作—结婚—生育”的线性过渡路径被更为碎片化和不确定的过渡模式所取代^[3]。

与西方社会相似,中国青年同样经历着较以往更为漫长的成年过渡期。在高等教育扩张与劳动力市场不确定性上升的背景下,青年的“学校—工作”转变(school-to-work transition)呈现出明显的推迟趋势:随着在学时间延长,越来越多青年的初次就业年龄后移^[4]。与此同时,第二次人口转变推动的个体主义价值观扩散重塑了青年的婚育观念,使结婚与生育年龄持续推迟^{[5][6]}。然而,与西方社会相比,中国青年就业、结婚和生育等关键生命事件的发生顺序仍总体保持稳定,尚未出现根本性重构^[7]。

婚姻缔结(“成家”)与职业获得(“立业”)常被视为青年向成年过渡的核心标志^[8]。尽管二者分别属于私领域和公领域,但在现实中呈现出日益紧密的互构关系。一方面,随着中国婚姻制度由“普婚早婚”向更具选择性的模式转变,稳定就业和可预期的经济前景逐渐构成青年在婚姻市场中获得认可与匹配机会的关键资源^[9];另一方面,作为伴随角色责

任、时间分配与经济义务变化的制度性安排,婚姻也会系统性地重塑个体,特别是女性的职业生涯^[10]。因此,“成家”与“立业”并非两个相互独立的事件,而是通过资源配置、社会规范与角色期待等机制相互嵌套、相互影响,共同构成中国社会中具有高度规范性的向成年过渡路径。

个体化、延迟化和不确定的向成年过渡过程不仅影响青年自身的发展,还会通过代际联系向上波及其父母^[11],这体现了生命历程理论中的“生命关联性”(linked lives)原理^[12]。该原理强调,个体的生命历程并非孤立展开,而是嵌入与他人尤其是家庭成员之间持续互动与相互依赖的关系网络之中。在家庭主义文化浓厚的中国社会,亲子的代际联结尤为明显,这令生命关联性原理在具体家庭实践中得以具象化。一方面,家庭本位取向和孝道伦理强化了代际责任的绑定,使个体生命事件决策高度“家庭化”;另一方面,子女“成家”“立业”等事件往往被视为代际共同完成的“任务”,而非纯粹的个人选择。既有研究表明,子女的婚姻、就业及社会经济地位获得与父母的主观福祉密切相关^{[13][14][15]}。然而,这些研究多聚焦单一的生命事件,较少同时考察“成家”与“立业”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及其整体性影响,也缺乏对其中主要作用机制的系统检验。此外,在父权文化背景下,儿子与女儿作为不同性别角色的承载者,其成年角色获得可能引发差异化的代际反馈,但相关实证证据仍然有限。

近年来,国际上越来越多的研究强调公领域与私领域之间的互构性(interconnectedness),探讨二者在生命历程中究竟是相互补偿还是相互强化,提出从整体性(holistic)视角来研究不同领域生命事件对

人生福祉的共同影响,即对生命历程的研究不能只关注单一事件的长期影响,而应认识到生命历程是不同领域人生事件相继展开的过程,具有多维度性(multidimensionality),这既体现在研究要同时关注不同领域的人生发展并将之视为一个整体,也体现在应评估整体性的人生进展对后续福祉产生的影响^{[16][17]}。若从这一视角出发,个体的职业发展与家庭组建不应被视为彼此独立的生命事件,向成年过渡也并非由单一事件所构成,而是一个需要青年在公领域与私领域同步取得进展并成功获得多重社会角色(如劳动者、伴侣等)的整体性过程。子女是否既实现劳动角色也实现家庭角色,不仅决定其自身向成年过渡过程的完整性,也可能通过代际的生命关联性影响父母的福祉。在家庭本位文化伦理的影响下,这种代际生命历程的关联或联动尤为突出,使得子女成家立业的完成度成为父母评估自身养老前景与代际关系质量的重要参照。基于此,本文将从整体性视角出发,利用近三期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The China Health and Retirement Longitudinal Study,简称CHARLS)公开数据,探讨成年子女成家立业状态对父母主观福祉的代际溢出(spillover)效应及其作用机制。

二、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在中国社会情境下探讨子女成家立业对父母主观福祉的影响需要回答并检验两个问题:一是子女成家立业为何会影响父母的福祉;二是这种影响主要通过何种机制来实现。针对第一个问题,需要将其置于中国代际关系模式由传统“反馈模式”向现代“互惠模式”转变的宏观背景中加以理解,相关文献回顾将聚焦中国代际关系变迁背景下子女成家立业影响父母主观福祉的理论与经验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对这一关系及其性别差异提出假设。第二个问题关注的是中介机制,本文将从既有文献在探讨老年人福祉时普遍关注的养老保障与亲子关系两个维度出发梳理相关文献并形成相应假设。

(一)从反馈到互惠:子女成家立业为何会影响父母福祉

在中国文化传统中,“成家立业”长期被视为衡量子女是否真正步入成年的核心标准,并承载着父

母对于家庭延续、养老保障以及代际回馈的多重期待。传统中国社会以亲子关系为家庭组织的基本轴心之一^[18],在“亲子一体”的文化框架下,亲代与子代之间形成了高度紧密的代际联结,在经济供养、情感支持与责任义务等层面呈现出深度交织的特征。由此,父母往往对子女的生命历程有较为清晰的角色期待^[19]。一方面,中国代际关系的核心运行逻辑体现为费孝通所概括的“反馈模式”^[20],父母年老阶段的生活高度依赖子代,特别是儿子提供的代际支持;另一方面,中国父母也常将子女视为自身生命意义的延续,将子女的发展或成就内化为对自身养育投入的回报与成功的象征^[21]。在这一文化背景下,成年子女是否实现“成家立业”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父母是否成功履行养育责任的重要标志。

尽管现代化进程与个体主义价值观的兴起改变了家庭结构和代际互动方式,但当代中国家庭仍保持较强的代际团结,多代同住和代际支持依然普遍存在。与以儒家孝道为基础的传统家庭主义不同,当下的新家庭主义呈现出明显的“向下倾斜”特征,体现为家庭资源配置、情感投入与决策逻辑日益以子女需求为中心^[22]。在实践层面,父母在子女成年乃至成家后持续提供经济支持、家务协助和孙辈照料,而这些投入被视为未来获得子女养老支持的重要基础,由此,传统社会的“反馈模式”逐渐向“互惠模式”转变^[23]。在认知层面,个体主义价值观的增长主要体现在青年子代,而父母一代仍倾向于将子代的个人幸福视为其日常生活的“终极意义”^[24]。“扶上马,再送一程”,支持子女成家立业构成了中国父母普遍认同的“责任伦理”^[25]。

近年来已有一些研究关注到子代的人生转变对父母福祉的影响。例如,陈丹、同钰莹的研究发现,儿子婚姻的延迟对父母心理健康会产生显著的负面影响,父母对代际关系的满意度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当儿子大龄未婚时,父母更可能对亲子关系表示不满意,从而进一步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13]。陈佳鞠等人的研究发现,成年子女社会经济地位所蕴含的物质性与符号性资源均对父母心理健康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子女较高的社会经济地位不仅能够为父母提供更多经济支持,还可以通过扩大老年

父母的社会交往网络,进而抑制其抑郁症状^[26]。

然而,上述研究多将子代的婚姻状况或社会经济地位作为相对独立的分析对象,尚未将二者置于统一框架中加以考察,因而难以揭示子女“成家”与“立业”之间相互嵌套的整体性影响机制。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父母不仅承担抚育与培养子女的责任,还被赋予确保子女顺利完成向成年过渡的道德义务,使其能够组建家庭、生儿育女,并进入为人父母的生命循环,维持“香火”绵续^[18]。父母对子女的养育责任与代际期待呈现多维度特征:除了“成家”以外,还包括子女在教育上取得成功、在劳动力市场中站稳脚跟等。从这一视角来看,子女仅实现就业或仅进入婚姻,仍难以被视为完全回应了父母的代际期待;唯有在“成家”与“立业”两方面均取得进展,父母才能更充分地感受到养育责任的实现与代际付出的回报,代际的“均衡互惠”也才具备能够实现的制度与情感基础^[20]。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1:子女成家立业状态影响父母的主观福祉,子女既成家又立业最有利于父母的主观福祉。

在性别化成年规范和父权文化的影响下,儿子与女儿的成家立业具有不同的代际功能与社会意义。首先,从代际交换理论视角看,父母对子女的投资与回馈预期具有明显的性别不对称性。在父系继嗣传统之下,儿子长期作为家庭经济安全与代际回馈的主要承担者^[27],父母对儿子的养老依赖程度通常也更高。在日常生活中,父母更可能向儿子提供代际支持^[28],并在财产继承安排等方面表现出明显的性别倾向^[29]。其次,社会规范对男性和女性的角色期待也存在差异^[30],对男女青年向成年过渡赋予不同的责任内涵和象征意义。儿子的成家立业被视为“接续家业”的核心标志,其成功更容易被父母内化为对自身养育成效与人生价值的确认,因而具有更强的规范约束力与情感权重^[31]。再次,从婚姻市场与家庭资源配置的角度看,儿子“成家”的成本通常更高,对父母的经济依赖性也相对更强。既有研究表明,男性在婚姻市场中的竞争力高度依赖其经济潜力,稳定就业与经济基础往往构成其进入婚姻的关键条件^[9]。在性别比失衡的背景下,部分社会

经济地位较低的男性面临明显的婚姻挤压,其婚姻困境往往进一步转化为父母的经济负担与心理压力^[13]。因此,相较于女儿,儿子成家立业往往更容易与家庭延续、养老保障与代际回馈的期待相联系,一定程度上也更容易转化为父母对未来生活安全、家庭成功与人生圆满的主观心理体验,从而可能会对父母主观福祉产生更为显著的影响。基于上述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 2:儿子成家立业状态对父母主观福祉的影响比女儿更大。

(二) 保障与情感:子女成家立业通过何种机制影响父母的主观福祉

现有研究在探讨子代婚姻或就业对父母主观福祉的影响时,对其作用机制的系统分析相对不足。从代际关系的视角来看,父母的主观福祉不仅取决于其对晚年能否获得子女养老这一工具性支持的预期,也深刻嵌入能否在家庭互动过程中体验到情感和亲子关系上得到满足。子女的成家与立业一方面决定了他们能够给父母养老提供工具性支持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影响他们与父母之间的亲子关系和父母的情感和角色体验等。基于此,本文重点从养老的工具性保障与亲子关系两个机制出发,分析子女成家立业对父母主观福祉的潜在影响路径。

从养老保障机制来看,父母晚年的主观福祉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子女所能提供的经济保障和照料支持,而“立业”和“成家”均有助于增强这种保障。就“立业”而言,拥有稳定工作的子女不仅在经济上更少依赖父母^[32],而且有能力为父母提供日常生活支持、健康照料和社会资源^{[33][34]}。在社会保障制度相对薄弱、孝道文化影响更为深远的农村地区,父母更加依赖子女养老^[35],因此其福祉也更易受到子女状况的影响^[36]。相反,子女职业发展受阻不仅限制其供养能力,也可能削弱父母对未来养老支持的信心,从而对其主观福祉产生不利影响^[37]。

就“成家”而言,子女婚姻往往伴随着自身经济能力与家庭责任的提升,有助于增强其履行赡养父母义务的能力^[38]。相比之下,未婚子女经济独立性较弱,更可能与父母共同居住^{[39][40]},对父母的经济依

赖程度更高^[41]。此外,子女婚姻状态还会通过改变父母的经济行为间接影响其主观福祉。拥有未婚子女尤其是未婚儿子的父母,更可能延长工作时间、增加储蓄并压缩消费^{[14][38]},为支持子女“成家”这一“家庭项目化目标”做准备^[42]。反之,子女顺利成婚则有助于缓解这种经济压力,提高父母的养老安全感和对未来的信心,进而影响他们的生活满意度^[43]。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3:子女成家立业状态通过养老保障机制影响父母的主观福祉。具体而言,拥有已成家立业子女的父母养老预期更为积极,生活满意度更高;而拥有尚未完全成家立业子女的父母养老预期更低,更担心自己年老时无法获得生活照料,生活满意度更低。

除养老预期以外,子女成家立业还通过亲子关系机制影响父母福祉。传统儒家孝道强调子女对父母物质上的“养亲”与精神上的“爱亲”“敬亲”“悦亲”相结合^[44]。父母对子女的期待不仅体现在经济供养和生活照料层面,也包括子女对父母的情感关怀、达成父母的心愿、尊重甚至顺从父母的意志与期望^{[22][45]},以及通过社会地位提升(如“金榜题名”“光宗耀祖”)为家庭带来他人尊重和社会认可等符号性社会回报^{[15][26][37]}。因此,子女的人生进展成为影响父母评估代际关系质量与养育成效的重要参照。

从“成家”的维度看,婚姻既是个体生命历程中的关键转折点,也是一种高度制度化的社会安排,承载着明确的家庭责任与伦理期待^[5]。一方面,由于生育在中国仍高度依赖婚姻制度^[6],婚姻的延迟意味着家庭延续这一核心伦理任务被阶段性搁置,由此产生的不确定性可能会降低父母的主观福祉;另一方面,中国社会仍普遍存在较强的婚姻规范与婚姻期待,对大龄未婚和单身生活方式的文化包容度仍然有限,未婚者往往面临刻板印象、偏见与社会压力^[46]。父母期望子女在适婚年龄尽快“成家”,一定程度上也是迫于子女适龄未婚偏离社会角色时间表

所带来的社会舆论压力^[47]。

从“立业”的维度看,子女的职业成就不仅关系到当前可提供的支持,也影响父母对未来的心理预期^[11]。当子女社会经济地位较低或就业不稳定时,父母更容易对其职业前景和经济独立性感到担忧^{[48][49]}。如果父母将子女的事业不顺解读为发展失败,则更可能产生内疚与失望等负面情绪,进而损害其心理福祉^{[50][51]}。

由此可见,“成家”与“立业”作为高度规范化的生命历程事件,均深受社会价值与文化期待的塑造。未完全实现成家立业的子女往往意味着父母需持续投入经济与情感支持^[32],这种延长的依赖关系更容易转化为父母的心理压力源,损害其心理健康^[52]。此外,成家立业的延宕不仅意味着代际支持与家庭延续目标的暂时受阻^[53],还可能被父母内化为自身养育责任“尚未完成”甚至养育“失败”的信号,从而产生对子代的不满,这种不满会在家庭互动中以代沟形式展现,影响亲子关系质量^{[54][55]}。据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假设4:子女成家立业状态通过亲子关系机制影响父母的主观福祉。具体而言,拥有已成家立业子女的父母对亲子关系评价更高,其生活满意度也更高;而拥有尚未完全成家立业子女的父母对亲子关系评价相对更低,生活满意度也更低。

三、数据、变量和方法

(一)数据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武汉大学和北京大学共同主持的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项目。这是一项面向中国内地45岁及以上人群的大型全国性追踪调查项目,基期调查于2011年启动。本文合并使用了2015年、2018年和2020年三期调查数据,并采用纵向合并(append)的方式构建混合截面样本^①。

样本筛选过程中,首先保留了年龄在45—70岁的受访者,该年龄段的受访者最有可能拥有处于成年过渡阶段的子女。其次,删除未婚或无子女的受

①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目前公开的最近轮次是2020年。2015年、2018年和2020年调查在本文所关注的测量题项上保持一致,具有良好的跨期可比性,其他轮次的调查则由于未采集研究所涉的关键变量而未予纳入。

访者,并进一步限定为所有子女年龄均在35岁及以下,且至少拥有一名23岁及以上子女的受访者。对受访者子女年龄限定的主要原因是,一般认为35岁是青年阶段的上限,而23周岁是绝大多数青年已完成大学教育的年龄,这一年龄节点标志着绝大多数青年开始向婚姻和就业这两个重要的生命事件过渡。最后,采用列表删除法(listwise deletion)剔除在任一分析变量上存在缺失值的样本,最终获得19008条(人次)有效观测样本。其中,80.2%的受访者至少有一个儿子,69.1%的受访者至少有一个女儿。

(二)变量

本文使用生活满意度测量主观福祉,使用访题“总体来看,您对自己的生活是否感到满意?”来测量,将选项从“一点也不满意”到“极其满意”按1—5分赋值,取值越大代表生活满意度越高。

核心自变量为子女的成家立业状态。其中,“成家”依据子女的婚姻状况界定,目前婚姻状态为“已婚”的子女被定义为“已成家”,其余则被定义为“未成家”。“立业”则界定为子女是否具备独立的经济能力,主要通过就业状况(在业、非在业)和收入状况(有收入、无收入)进行衡量。若子女在调查时既有工作又有收入,则定义为“已立业”,否则定义为“未立业”。鉴于样本中有73%的受访者拥有2个及以上子女,本文基于其所有子女的成家立业状况,并区分子女性别,构建了8个二分类变量,具体包括:受访者是否拥有“成家立业型”儿子/女儿,是否拥有“事业导向型”(已立业但未成家)儿子/女儿,是否拥有“家庭导向型”(已成家但未立业)儿子/女儿,以及是否拥有“未婚待业型”(未成家且未立业)儿子/女儿。

中介变量包括预期照料可获得性和亲子关系评价。预期照料可获得性体现了养老保障的预期。养老保障预期应包括对经济上的预期和照料上的预期,但由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未采集有关父母对子女未来经济支持程度的预期,所以本文仅考察父母对照料可获得性上的预期。由于分析样本为子女处在向成年过渡期的父母,其年龄集中在中年

和低龄老年期,且处于就业状态者和参加社会养老保险的比例较高,对子女的经济依赖度尚未体现出来,预期照料可及性可能更适合反映父母对养老风险的主观评估。这一变量通过问题“如果以后在日常生活方面需要照顾,比如吃饭、穿衣,有亲人或朋友能长期照顾吗?”以及“他/她是您的什么人?”进行测量。当受访者回答“是”(即有亲人或朋友能长期照顾),且预期照料的提供者“子女、儿媳/女婿、孙子女/外孙子女”时,赋值为1,否则赋值为0。亲子关系评价通过问题“您对您和您子女的关系满意吗?”一题进行测量,选项从“一点也不满意”到“极其满意”分别赋值为1—5分,取值越大表示受访者对亲子关系评价越积极。

控制变量包括受访者的性别(女性=0,男性=1)、年龄(岁)、婚姻状态(已婚=0,离异/丧偶=1)、居住地类型(农村=0,城镇=1)、受教育年限(年)、就业状况(分为务农、非农工作、退休/无工作)、去年是否领取工资(否=0,是=1)、社会养老保险参与情况(分为未参与、参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参与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养老保险)。子女特征方面的控制变量包括存活儿子数和女儿数(个),以及子女最高受教育年限(年)。此外,受访者的健康状况也被纳入控制变量行列,具体包括是否有慢性病(否=0,是=1)、是否有健康工作能力(否=0,是=1)以及日常生活活动能力3个指标。健康工作能力使用“是否因为残疾或健康原因,无法正常工作或劳动”来测量,“做起来没有问题”赋值1,表示健康状况较好;回答“完全无法正常工作或劳动”“不能长时间工作或劳动”赋值0,表示健康状况较差。日常生活活动能力通过穿衣、洗澡、吃饭、上下床、如厕以及控制大小便6项基本活动的完成情况进行衡量,对“有困难,需要帮助”和“无法完成”的情形赋值为1,其余情况赋值为0,并将6项指标加总形成总分,取值越高表示日常生活能力受限程度越高。模型中还进一步控制了受访者在上一期调查中的生活满意度,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潜在的反向因果问题。上述控制变量在分析样本中的特征描述见表1。

表 1 样本特征的描述统计结果

变量	均值(标准差)/百分比	变量	均值(标准差)/百分比
性别(男性=1)	48.6%	参与城乡居民养老保险	64.9%
年龄(岁)	53.560(4.442)	参与政府机关/企事业单位养老保险	16.2%
受教育年限(年)	6.748(3.893)	是否有健康工作能力(是=1)	80.8%
婚姻状态(离异/丧偶=1)	5.1%	是否有慢性病(是=1)	75.2%
居住地类型(城镇=1)	39.5%	日常生活活动能力	0.178(0.632)
去年是否领取工资(是=1)	35.9%	儿子数(个)	1.047(0.703)
就业状况		女儿数(个)	0.983(0.864)
务农(参照组)	34.5%	子女最高受教育年限(年)	12.010(3.596)
非农工作	44.6%	数据年份	
退休/无工作	20.9%	2015 年	32.5%
社会养老保险参与情况		2018 年	36.6%
未参与(参照组)	18.9%	2020 年	31.0%

资料来源:2015 年、2018 年和 2020 年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

(三) 方法

鉴于子女的婚姻与就业状态对父母的主观福祉可能存在选择性偏差,即子女和父母的特征均会影响受访者(父母)拥有怎样的子女及其本人的主观福祉,本文采用逆概率加权法(inverse probability of treatment weighting,简称 IPTW)进行因果推断分析^[56]。逆概率加权法是一种基于观察性数据模拟随机对照试验的因果推断方法,其核心思想是通过为每个样本赋予逆概率权重,调整处理组与对照组在协变量上的分布差异,使二者在统计意义上趋于平衡,从而实现对处理效应的无偏估计。

具体而言,逆概率加权法的实施过程包括以下三个步骤。第一步,构建处理模型以估计倾向得分(propensity score)。本文分别以子女的 8 种成家立业状态为因变量,以表 1 中所列的受访者本人特征及其子女特征为自变量,构建 logit 模型预测个体拥有每一种子女成家立业状态的概率,即倾向得分。第二步,计算稳定逆概率权重(stabilized inverse probability weights)。对于处理组样本,逆概率权重赋值为 k/e ,其中 e 表示倾向得分, k 为接受该处理状态的比例;对于对照组样本,逆概率权重设定为 $(1-k)/(1-e)$ 。第三步,进行加权因果效应估计。基于上述稳

定逆概率权重,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OLS)对父母主观福祉进行回归分析,以检验子女成家立业状态对父母主观福祉的因果影响。

在机制分析部分,本文进一步采用 Karlson-Holm-Breen(KHB)方法,对子女成家立业状态影响父母主观福祉的作用机制进行检验^[57]。通过该方法,将总效应分解为直接效应以及通过养老保障机制和亲子关系机制所产生的间接效应,揭示子女成家立业状态影响父母主观福祉的潜在机制。

为纠正同一受访者在 2015 年、2018 年和 2020 年重复出现造成的标准误低估,本文对个体层面进行聚类标准误调整,同时在回归模型中控制调查年份。

四、结果分析

(一) 描述统计结果

图 1 所示为拥有不同成家立业类型子女的父母比例,分别以至少拥有 1 名儿子和至少拥有 1 名女儿的父母作为分母进行统计。样本中拥有“成家立业型”子女的父母占比最高,拥有此类儿子和女儿的父母比例分别为 55.7% 和 57.1%。拥有“事业导向型”儿子和女儿的父母比例分别为 30.7% 和 19.2%;相比之下,拥有“家庭导向型”女儿的比例

(23.0%)明显高于拥有“家庭导向型”儿子(4.0%)。此外,拥有“未婚待业型”子女所占比例相对较低,有此类型儿子和女儿的父母比例分别为6.3%和4.8%。总体来看,儿子和女儿成家立业状态呈现出一定的性别差异。这种差异反映了“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性别分工文化的影响;男性更可能投入更多的精力在劳动力市场当中而一定程度上延迟进入婚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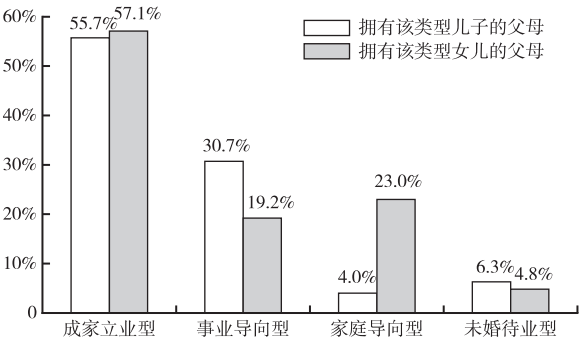


图1 拥有不同成家立业类型子女的父母比例

女性更可能在适婚年龄优先进入婚姻,并以家庭为核心选择退出或暂缓就业,或因生育而中断就业。

表2报告了拥有不同成家立业类型子女的父母在生活满意度上的均值差异,并分别按子女性别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在有儿子的家庭中,拥有“成家立业型”儿子的父母生活满意度显著高于儿子无此类情况者($p < 0.001$)。相反,拥有“事业导向型”和“未婚待业型”儿子的父母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未拥有此类儿子的父母,差值分别为 -0.081 ($p < 0.001$)和 -0.132 ($p < 0.001$)。而是否有“家庭导向型”子女的父母在生活满意度上未有显著差异。在有女儿的家庭中,拥有“成家立业型”女儿的父母生活满意度也显著更高($p < 0.001$),但其效应幅度相对儿子较小。与之相对,拥有“家庭导向型”女儿的父母生活满意度显著低于未拥有者($p < 0.01$)。相比之下,有无“事业导向型”和“未婚待业型”女儿的父母在生活满意度上未有显著差异。

表2 拥有不同成家立业类型子女的父母生活满意度均值比较

类型	儿子的情况			女儿的情况		
	有	无	差值	有	无	差值
成家立业型	3.319	3.227	0.092 ***	3.309	3.262	0.047 ***
家庭导向型	3.319	3.277	0.042	3.251	3.300	-0.049 **
事业导向型	3.222	3.303	-0.081 ***	3.276	3.291	-0.015
未婚待业型	3.155	3.287	-0.132 ***	3.288	3.289	-0.001

注:表中数值为父母生活满意度均值。“差值”为是否拥有该类型子女的两组均值之差。差值显著性采用独立样本 t 检验进行检验;*、**、***分别表示在5%、1%和0.1%的水平上显著。

表2的结果初步表明,子女是否实现“成家立业”与父母生活满意度呈现稳定的正向关联,且该关联在儿子身上表现得更为明显;而子女尤其是儿子未能完全成家立业,更可能与父母较低的生活满意度相关。由于子女的婚姻与就业状态均可能存在选择性偏差,本文在后续分析中进一步使用逆概率加权法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分别检验儿子和女儿不同成家立业状态对父母主观福祉的影响。

(二) 子女成家立业状态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图2所示为基于逆概率加权模型的可视化回归

结果,报告了不同成家立业状态的子女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整体而言,父母生活满意度与儿子成家立业状态之间存在显著关联(左图),而与女儿成家立业状态的关联性则相对较弱(右图),呈现出明显的性别差异。

具体来看,与没有“成家立业型”儿子的受访者相比,拥有“成家立业型”儿子的父母生活满意度显著提高0.071分($p < 0.001$)。相反,拥有“未婚待业型”儿子的受访者生活满意度水平最低,其得分比未拥有此类型儿子的受访者低0.105分($p < 0.001$)。此外,拥有“事业导向型”儿子的父母,其生活满意

度比没有此类儿子的父母亦显著降低 0.048 分($p < 0.001$),而拥有“家庭导向型”儿子的父母,其生活满意度与无此类儿子父母之间的差异并未达到统计显著性水平($p > 0.05$)。

上述结果表明,在中国语境下,儿子是否完成向成年角色的关键转变,尤其是否进入婚姻,对父

母生活满意度产生重要影响。相较而言,儿子的“成家”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明显强于其“立业”,显示出父母对子女婚姻完成度的高度关注,而就业状态的重要性则相对次之。这一发现与中国家庭中以婚姻为核心的成年规范及其象征意义高度契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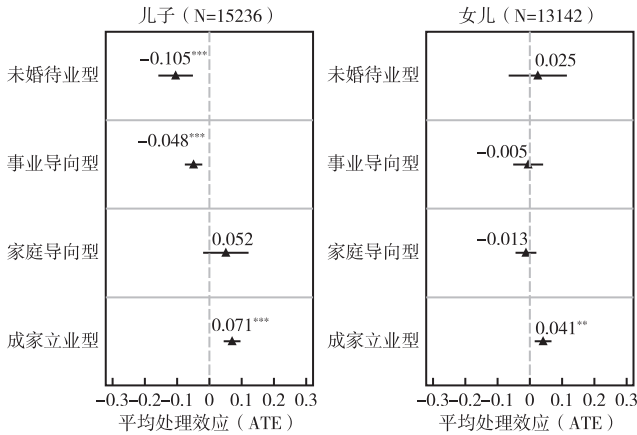


图2 拥有不同成家立业状态的子女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注:各模型均纳入了控制变量;图中数值表示基于逆概率加权法的平均处理效应,横线代表 95% 置信区间;*, **, *** 分别表示在 5%、1% 和 0.1% 的水平上显著。

相比之下,女儿成家立业状态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整体较为有限。结果显示,拥有“成家立业型”女儿同样能够显著提升父母的生活满意度,其效应为 0.041 分($p < 0.001$),但拥有“成家立业型”女儿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积极影响明显小于拥有“成家立业型”儿子的影响。与此同时,拥有“未婚待业型”“事业导向型”或“家庭导向型”女儿的父母,其生活满意度与参照组之间均未发现显著差异($p > 0.05$),表明女儿未完全实现“成家立业”并不会显著损害父母的主观福祉。

综合来看上述结果,子女成家立业状态对父母主观福祉的影响具有显著的性别异质性:相较于女儿,儿子的成家立业状况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影响更大。这一发现为假设 1 和假设 2 提供了有力的经验支持。

在多子女家庭中,父母往往同时面对不同成年过渡完成度的子女组合。因此,仅考察是否拥有某一成家立业类型的子女,可能不足以全面揭示子女成家立业整体进展对父母主观福祉的影响。为此,

我们进一步将样本限定为至少拥有两名同一性别子女的受访者,将子女成家立业状态拓展为多子女组合类型。具体而言,我们分别构造了 6 个自变量:“儿子均未成家立业”“部分儿子成家立业”“全部儿子成家立业”“女儿均未成家立业”“部分女儿成家立业”“全部女儿成家立业”。在此基础上,采用多分类 logit 估计广义倾向得分,并重新计算稳定逆概率权重,以“儿子/女儿均未成家立业”作为参照组,重新估计逆概率加权模型。图 3 所示为回归分析的可视化结果。

图 3 左侧(儿子)显示,在控制协变量后,儿子成家立业的“覆盖程度”与父母生活满意度呈现清晰的梯度关系:与参照组“儿子均未成家立业”相比,“全部儿子成家立业”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正向作用最大,生活满意度显著提高 0.115 分($p < 0.001$)。这表明,当家庭中所有儿子都完成“成家立业”这一关键成年角色转变时,父母能够获得更强的生活安全感与心理安慰,其主观评价得到显著改善。与此同时,“部分儿子成家立业”同样能够显著提升父母

生活满意度,效应为 0.077 分($p < 0.05$),但幅度小于“全部儿子成家立业”。这一结果表明,在多子女家庭中,父母的主观福祉并非仅由某一名子女的成功

过渡所决定,而更取决于子女成家立业完成度的整体水平;当仍有儿子未完成成年角色转变时,父母的担忧与资源压力可能依然存在,从而削弱总体增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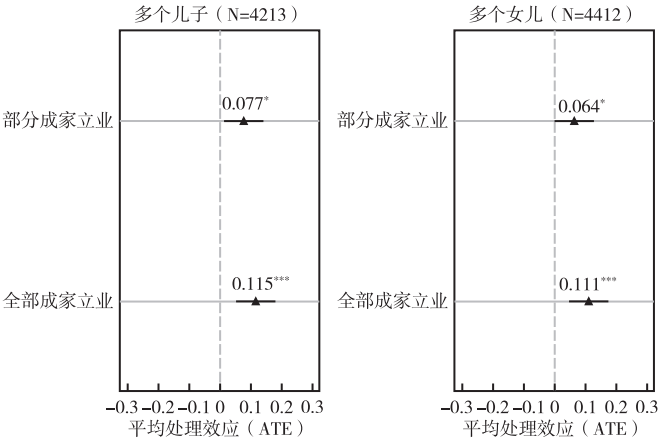


图3 子女成家立业完成度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影响(多子/女样本)

注:各模型均纳入了控制变量;图中数值表示基于逆概率加权法的平均处理效应,横线代表95%置信区间;*,**、***分别表示在5%、1%和0.1%的水平上显著。

图3右侧(女儿)呈现出与儿子相一致的模式:与“女儿均未成家立业”的参照组相比,“全部女儿成家立业”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促进作用最为显著,生活满意度提高0.111分($p < 0.001$);“部分女儿成家立业”同样带来显著提升,效应为0.064分($p < 0.05$)。同样,这种从“部分完成”到“全部完成”的递进关系表明,女儿成年角色的整体完成度越高,父母生活满意度越高,呈现出一定的累积性特征。

(三) 预期照料可获得性和亲子关系评价的中介效应检验

接下来本文使用KHB中介效应分解方法,分别以父母预期照料可获得性及亲子关系评价作为中介

变量,检验二者在子女成家立业状态影响父母主观福祉过程中的中介作用。

表3显示,拥有“成家立业型”儿子能够显著增强父母的养老预期与代际情感联结,从而提升其生活满意度。具体而言,有“成家立业型”儿子的父母对预期照料可获得性的信心显著提高,亲子关系评价也明显改善,并由此促进其生活满意度的提升。预期照料可获得性和亲子关系评价分别能够解释有“成家立业型”儿子对父母生活满意度影响总效应的13.1%、28.2%。这一发现表明,儿子在同时完成婚姻与就业角色后,不仅增强了父母对未来养老支持的信心,也改善了代际互动质量,从而显著提升父母的主观福祉。

表3 子女成家立业状态对父母生活满意度影响的KHB中介效应检验

变量	中介变量			
	预期照料可获得性		亲子关系评价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有“成家立业型”儿子				
总效应	0.071 ***	(0.013)	0.071 ***	(0.012)
直接效应	0.061 ***	(0.013)	0.051 ***	(0.012)

续表

变量	中介变量			
	预期照料可获得性		亲子关系评价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中介效应	0.009 ***	(0.002)	0.020 ***	(0.005)
中介效应占比	13.1%		28.2%	
有“未婚待业型”儿子				
总效应	-0.105 ***	(0.027)	-0.105 ***	(0.027)
直接效应	-0.093 ***	(0.027)	-0.071 **	(0.027)
中介效应	-0.013 ***	(0.003)	-0.034 **	(0.011)
中介效应占比	12.2%		32.7%	
有“事业导向型”儿子				
总效应	-0.048 ***	(0.014)	-0.048 ***	(0.013)
直接效应	-0.042 **	(0.014)	-0.038 **	(0.013)
中介效应	-0.007 ***	(0.001)	-0.010 *	(0.005)
中介效应占比	14.0%		21.2%	
有“家庭导向型”儿子				
总效应	0.052	(0.036)	0.052	(0.031)
直接效应	0.048	(0.036)	0.059	(0.031)
中介效应	0.003	(0.003)	-0.007	(0.014)
中介效应占比	—		—	
有“成家立业型”女儿				
总效应	0.041 **	(0.014)	0.041 **	(0.013)
直接效应	0.040 **	(0.014)	0.032 *	(0.013)
中介效应	0.001	(0.001)	0.008	(0.005)
中介效应占比	—		—	
有“未婚待业型”女儿				
总效应	0.025	(0.044)	0.025	(0.040)
直接效应	0.026	(0.044)	0.018	(0.040)
中介效应	-0.001	(0.003)	0.007	(0.017)
中介效应占比	—		—	
有“事业导向型”女儿				
总效应	-0.005	(0.023)	-0.005	(0.021)
直接效应	-0.005	(0.023)	-0.020	(0.021)
中介效应	-0.000	(0.002)	0.014	(0.008)
中介效应占比	—		—	

续表

变量	中介变量			
	预期照料可获得性		亲子关系评价	
	系数	稳健标准误	系数	稳健标准误
有“家庭导向型”女儿				
总效应	-0.013	(0.016)	-0.013	(0.015)
直接效应	-0.012	(0.016)	-0.001	(0.015)
中介效应	-0.001	(0.001)	-0.012 *	(0.006)
中介效应占比	—		—	

注:各模型均纳入所有控制变量;*、**、***分别表示在5%、1%和0.1%的水平上显著;“—”表示中介效应不显著。

与此对照的是,拥有“未婚待业型”儿子的父母,其生活满意度的总效应呈显著负向。其中,预期照料可获得性解释了该总效应的12.2%,而亲子关系评价的中介比例高达32.7%,表明情感层面的代际关系质量在其中发挥了更为重要的作用。类似地,拥有“事业导向型”儿子同样会显著降低父母对未来可获得照料的信心,并弱化亲子关系质量,两种中介机制分别解释了总效应的14.0%和21.2%。这表明,即便儿子实现了就业,若未完成婚姻角色,其向成年过渡的不完整性仍会通过削弱代际支持预期与情感联结,对父母的主观福祉产生负向影响。

相比之下,预期照料可获得性和亲子关系评价在女儿成家立业状态与父母生活满意度之间的中介效应均不显著($p > 0.05$)。这一结果进一步印证了前文的性别异质性发现,即在当前中国家庭结构与代际支持模式下,父母对女儿的养老期望与情感依赖程度相对较低,其成家立业状态无法通过上述机制转化为父母的主观福祉。

总体而言,表3的中介分析结果清晰表明,预期照料可获得性与亲子关系评价是儿子成家立业状态影响父母生活满意度的重要作用机制。上述发现不仅深化了对子女向成年过渡如何影响父母主观福祉的机制性理解,也为性别化代际期待与父权家庭结构情境下的代际联动机制提供了有力的经验证据。因此,本文提出的假设3和假设4均得到了数据支持。

(四) 稳健性检验

本文还从以下两个方面对研究结果的稳健性进

行检验。

第一,重新定义核心自变量。以上分析将子女离异、丧偶状态统一归为未“成家”。严格来说,离异与丧偶虽表现为婚姻关系的终止,但与“未婚”(从未进入婚姻)相比,在婚姻经历与社会意义上存在显著差异。一方面,离异或丧偶的子女可能已经生育了下一代,完成了家庭延续的代际责任。另一方面,既有研究表明,子女离异对父母心理福祉的负向影响往往比子女未婚更大^[58]。基于此,我们将子女婚姻状态重新划分为“未婚”“在婚(含初婚、再婚)”,并排除离异、丧偶等特殊婚姻状态,以更精准捕捉“成家”的婚姻实质。经上述调整后,模型估计结果与原有分析结论保持一致。

第二,使用抑郁症状评分替换生活满意度。我们使用包含10个条目的中国版流调中心抑郁量表(CES-D)评分作为因变量测量父母的主观福祉。该量表的取值范围为0—30,取值越高代表抑郁症状水平越严重,即主观福祉水平越低。在替换因变量后,本文的主要研究结论依然成立^②。

五、结论与讨论

本文采用生命历程研究中的整体性视角和“生命关联性”视角,将职业发展与家庭组建这两个相互嵌套的人生领域联系起来,将两代人生的人生关联起来,利用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三期调查数据,研究子女“成家”“立业”两项关键成年过渡事件对父母主观福祉的影响,并进一步揭示了其中的性别差

②限于篇幅,稳健性检验具体结果不在文中赘述。

异与作用机制,形成以下三个核心结论。

第一,子女能否既实现“成家”又实现“立业”对父母主观福祉具有显著影响。相较于仅完成其中一项成年角色或均未完成的子女,拥有“成家立业型”子女的父母生活满意度显著更高;而拥有“未婚待业型”或“事业导向型”儿子的父母,其生活满意度仍会被显著削弱。由此可见,唯有当“成家”“立业”的人生转变均实现,子女才被普遍视为真正完成了向成年的过渡,父母所承担的养育责任与寄予子女的代际期待也才得以被认为阶段性“完成任务”。本研究还发现,在多子女家庭情境下,子女成家立业对父母主观福祉的影响呈现出明显的累积性与梯度特征。无论是儿子还是女儿,当家庭中“全部子女成家立业”时,父母的生活满意度提升幅度最大;“部分子女成家立业”虽同样具有正向影响,但效应弱于“全部子女完成成家立业”。这一结果表明,父母的主观福祉并非仅取决于某一名子女的成功过渡,而是与家庭内部子女成年过渡的完成度密切相关。上述发现是以往仅关注子女社会经济成就或家庭行为单一领域的研究未能充分反映的特征,也体现出青年私领域与公领域发展具有同等重要的社会意义。

第二,子女成家立业对父母主观福祉的影响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且儿子产生的效应明显强于女儿。本研究发现,儿子的成家立业状态不仅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影响程度高于女儿,而且其“未完成性”会显著损害父母福祉;相比之下,女儿是否完全成家立业,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负向影响并不显著,仅在“成家立业型”女儿的情形下呈现出一定的正向效应。可见,虽然女儿在父母养老的参与和投入中越来越成为不可或缺的角色^{[59][60]},但在当前中国家庭制度与性别文化中,儿子仍然在父母认知层面被普遍视为家庭延续、养老保障与代际回馈的责任主体,其向成年过渡的成败更容易被父母内化为自身晚年保障与人生圆满程度的重要依据。

第三,预期照料可获得性与亲子关系评价是儿子成家立业影响父母主观福祉的重要机制。中介分析表明,儿子成家立业既能通过增强父母对未来养老预期的信心从而提高其生活安全感,也能通过改善代际情感联结提升亲子关系评价,进而促进父母

的生活满意度。其中值得注意的是,亲子关系的解释比例要高于预期照料可获得性,说明在新家庭主义文化下,情感与规范层面的“关系回馈”在代际联动中发挥着更为关键的作用。这一发现凸显了代际关系质量在中老年主观福祉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

本研究不仅展现了生命历程视角下“生命关联性”原理在中国的理论生命力,也进一步丰富了其经验证据。“生命关联性”原理是美国社会学家格伦·H. 埃尔德(Glen H. Elder)提出的生命历程理论四大核心原理之一,体现了社会学在人的生命历程研究方面的独特学科贡献:人的成长与发展不仅取决于生理变化和心理发展,也深受周围他人的影响,而社会关系将不同个体的人生状况相互联系起来。在将这一原理应用于经验研究或进行实证检验时,西方情境下的研究多聚焦于夫妻之间或兄弟姐妹之间的“生命关联”,对代际“生命关联”的研究则侧重于关注父母的社会经济状况与价值观如何影响子女^[61]。这些学术关注点根植于西方的核心家庭传统和个体化的社会特征。相较之下,中国社会为探讨代际人生状态的相互关联与影响提供了更为丰富的情境。本文从成年子女在不同领域的人生事件如何共同影响父母主观福祉的角度出发,拓展了“生命关联性”原理在代际联动机制方面的经验证据,同时也丰富了主观福祉研究的相关讨论。这表明“生命关联性”原理如何发挥作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不同社会的主流家庭形态与家庭关系模式。

本文还对理解当下中国的代际关系具有一定的启发。尽管中国家庭结构与代际关系在近几十年中经历了深刻转型,但代际责任伦理依然具有高度稳定性,尤其表现为父母对子女“向下负责”的持续期待,这是下行式家庭主义或新家庭主义的重要特征^[22]。既有研究多从代际资源流向的实践层面加以论证,例如父母为子女购房、参与孙辈照料等具体行为,揭示了这种新家庭主义的运行逻辑,也展现出这种新家庭主义如一张“羽翼之网”(feathered net)为青年人提供了温暖托举和回旋空间^[40]。本文从主观福祉的角度出发,展现了父母在未能完成这种责任

下的心理福祉代价。尤其值得关注的是,子女成家立业状态通过亲子关系影响父母主观福祉的中介路径,其反映出当代中国社会子女的行为与父母对子女的期望之间的代沟或者代际价值冲突。在当前就业形势趋紧与婚姻家庭行为加速转型的背景下,青年在“立业”与“成家”两个领域均面临日益严峻的结构性挑战^[62]。既有研究已指出,不“立业”往往难以“成家”,实现经济独立与稳定就业仍是步入婚姻的重要前提^[8]。然而,随着受教育年限的持续延长以及劳动力市场竞争的加剧,青年进入职场的时间不断推迟,相当一部分青年人的择业周期显著拉长,甚至出现主动或被动退出劳动力市场的情形^[63]。而在此背景下,许多父母仍然持守相对传统的婚姻与就业“时间表”,普遍期待子代能够在“适龄”阶段成家立业,这就导致当代青年所面临的客观结构性约束及其价值观取向与其父母一代的生命经历与规范期待之间形成显著的代际张力与“孝道差异”(filial discrepancy)^[64]。不同于既有研究与社会舆论更多关注子代在此过程中所承受的催婚^[65]等压力与困境,本文呈现的是子女主动或被动延迟婚育与就业的情境下父母所承受的心理压力或困扰,这为理解中国家庭代际张力和促进代际和谐补充了来自父母视角的定量证据。

至于如何缓解这种家庭代际张力,一方面公众应认识到,不同世代所经历的结构性变迁与代际价值观演变并不同步,这需要两代人通过增进对话与理解以及发挥个体智慧来调适。另一方面,公共政策也应提供支持性的制度环境。从帮助父母的角度,可以通过完善养老和医疗保障、发展社区服务,减轻老龄人群在获得照护和社会支持上的后顾之忧,帮助他们在子女之外获得更充分的生活保障、社会支持与情感满足;从支持青年的角度,则需要创造更多就业岗位,严格落实标准工时制度,促进工作与

家庭的平衡,增强青年立业成家的能力和信心。

此外,国内代际关系的研究十分关注父母对女儿教育的投入和女儿在父母养老中所扮演的角色。本文的研究表明,女儿的个人发展也会影响父母中老年阶段的主观福祉,具体体现为女儿实现成家立业也能提升父母的主观福祉,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家庭对女儿重视度的提升。然而,从儿子未能完成成家立业对父母主观福祉存在更大的消极影响及其中介机制来看,许多父母在认知层面上仍将儿子视为家庭延续、养老保障与代际回馈的责任主体,这种具有性别刻板印象的期待不仅会加重父母的心理负担,也反过来会加剧青年男性在成家立业方面所承受的压力。

受限于数据和测量的可及性,本文存在以下局限。首先,本文所考察的青年样本主要集中于“80后”和一部分“90后”,尚未全面覆盖社会广泛关注的“Z世代”群体。对于更晚近的世代群体,他们中独生子女的比例更高,其父母大多成长于改革开放之后,价值观与行为模式的现代化程度普遍更高。在此背景下,这些父母在子女婚姻与职业选择上的规范性期待是否表现出更强的包容性,以及其对儿子和女儿的态度是否趋于一致,仍有待未来研究进一步检验。其次,本文对“成家立业”的界定主要基于婚姻与就业的基本状态,但在现实情境中,中国父母对“成家立业”的理解应更为复杂,一方面可能包含职业稳定性、居住安排乃至生育进展等多重维度;另一方面父母对子女成家立业的期待可能还包括时序规范,如应先成家还是先立业、多少岁之前完成成家立业等,而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的数据采集围绕中老年父母展开,对子女的信息采集相对较少,也缺乏子女就业和婚姻事件的准确时间信息,这些问题均有待在后续研究和其他来源数据中进一步深入探讨。

[参考文献]

- [1] Stanger-Ross, J., Collins, C., and Stern, M. J.. Falling Far from the Tree: Transitions to Adulthood and the Social History of Twentieth-Century America[J]. *Social Science History*, 2005, 29(4).
- [2] Walther, A., Stauber, B., Biggart, A., et al.. *Misleading Trajectories: Integration Policies for Young Adults in Europe?* [M]. Wiesbaden: VS Verlag für Sozialwissenschaften, 2002.

- [3] Du Bois-Reymond, M., and Blasco, A. L.. Yo-yo Transitions and Misleading Trajectories: Towards Integrated Transition Policies for Young Adults in Europe[A]. Blasco, A. L., McNeish, W., and Walther, A.. *Young People and Contradictions of Inclusion: Towards Integrated Transition Policies in Europe*[G]. Bristol: The Policy Press, 2003.
- [4] Jiang, J., Zhang, C., and Pan, X.. Changing Pathways in Young People's School-to-Work Transition: Evidence from the 2003–2021 Chinese General Social Surveys[J].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2025, 57(4).
- [5] Raymo, J. M., Park, H., Xie, Y., et al. Marriage and Family in East Asia: Continuity and Change[J]. *Annual Review of Sociology*, 2015, 41(1).
- [6] 於嘉. 何以为家: 第二次人口转变下中国人的婚姻与生育[J]. *妇女研究论丛*, 2022, (5).
- [7] Tian, F..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in China in 1982–2005: A Structural View[J]. *Demographic Research*, 2016, 34(16).
- [8] 潘修明、张春泥. 不“立业”, 难“成家”——青年—成年转变中的就业状态与婚育行为[J]. *中国青年研究*, 2023, (8).
- [9] Yu, J., and Xie, Y.. Changes in the Determinants of Marriage Entry in Post-Reform Urban China[J]. *Demography*, 2015, 52(6).
- [10] Sun, S., and Chen, F.. Women's Employment Trajectories during Early Adulthood in Urban China: A Cohort Comparison[J].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2017, (68).
- [11] Barr, A. B., Simons, L. G., Simons, R. L., et al.. Sharing the Burden of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African American Young Adults' Transition Challenges and Their Mothers' Health Risk[J].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2018, 83(1).
- [12] Elder, G. H., Johnson, M. K., Crosnoe, R.. The Emergence and Development of Life Course Theory[A]. Mortimer J. T., and Shanahan, M. J.. *Handbook of the Life Course*[G]. New York: Kluwer Academic/Plenum, 2003.
- [13] Chen, D., and Tong, Y.. Marriage for the Sake of Parents? Adult Children's Marriage Formation and Parental Psychological Distress in China[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21, 83(4).
- [14] Bai, J., Tang, J., and Xie, Q.. Does Children's Marriage Matter for Parents' Mental Health? Evidence from China[J]. *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2022, (78).
- [15] Wang, H., Han, S. H., Kim, K., et al.. Adult Children's Achievements and Ageing Parents' Depressive Symptoms in China[J]. *Ageing and Society*, 2022, 42(4).
- [16] Bernardi, L., Huinink, J., and Settersten, R. A.. The Life Course Cube: A Tool for Studying Lives[J]. *Advances in Life Course Research*, 2019, (41).
- [17] Comolli, C. L., Bernardi L., and Voorpostel, M.. Joint Family and Work Trajectories and Multidimensional Wellbeing[J]. *European Journal of Population*, 2021, 37(3).
- [18] 费孝通. 江村经济[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
- [19] 余家庆、胡安宁. 在“一体”关系中理解父母幸福——基于 2018 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的分析[J]. *社会学评论*, 2025, (2).
- [20] 费孝通. 家庭结构变动中的老年赡养问题——再论中国家庭结构的变动[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1983, (3).
- [21] Ryff, C. D., Lee, Y. H., Essex, M. J., et al.. My Children and Me: Midlife Evaluations of Grown Children and of Self[J]. *Psychology and Aging*, 1994, 9(2).
- [22] 阎云翔、杨雯琦. 社会自我主义: 中国式亲密关系——中国北方农村的代际亲密关系与下行式家庭主义[J]. *探索与争鸣*, 2017, (7).
- [23] 许琪. 扶上马再送一程: 父母的帮助及其对子女赡养行为的影响[J]. *社会*, 2017, (2).
- [24] Yan, Y.. The Individualization of the Family in Rural China[J]. *Boundary*, 2011, 38(1).
- [25] 杨善华. 以“责任伦理”为核心的中国养老文化——基于文化与功能视角的一种解读[J]. *晋阳学刊*, 2015, (5).
- [26] 陈佳鞠、赵若彤、李龙. 子女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父母心理健康的影响——“面子”效应还是“里子”效应[J]. *人口学刊*, 2025, (3).
- [27] Lei, L.. Sons, Daughters,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n China[J]. *Chinese Sociological Review*, 2013, 45(3).
- [28] Hu, A.. Providing More but Receiving Less: Daughters in Intergenerational Exchange in China's Mainland[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17, 79(3).

- [29] 宋月萍、刘志强、唐语新. 性别、照料与中国家庭财产继承——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数据的分析[J]. 妇女研究论丛, 2025, (2).
- [30] Tang, W., and Parish, W. L. *Chinese Urban Life under Reform: The Changing Social Contract* [M].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 [31] Schmutte, P. S., and Ryff, C. D. Success, Social Comparison, and Self-Assessment: Parents' Midlife Evaluations of Sons, Daughters, and Self [J]. *Journal of Adult Development*, 1994, 1(2).
- [32] Swartz, T. T., Kim, M., Uno, M., et al. Safety Nets and Scaffolds: Parental Support in the Transition to Adulthood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11, 73(2).
- [33] Torssander, J.. From Child to Parent? The Significance of Children's Education for Their Parents' Longevity [J]. *Demography*, 2013, 50(2).
- [34] Qin, Y.. Adult Children's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 and Older Adults' Self-Rated Health: A U. S. -China Comparison [J].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22, 77(6).
- [35] Cai, F., Giles, J., O'Keefe, P., et al. *The Elderly and Old Age Support in Rural China: Challenges and Prospects* [M]. Washington: The World Bank, 2012.
- [36] Zhang, W., and Silverstein, M.. Does the Economic Status of Adult Children Influence Self-Rated Health Among Older Adults in China? [J].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23, 78(9).
- [37] Zhao, M., and Tong, Y.. Beyond the Paycheck: Family Systems, Adult Children's Job Sector, and Parental Subjective Well-Being in China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25, 87(5).
- [38] Sun, H.. Effects of Adult Children's Marriage on Household Stock Market Participation: An Event-Study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Approach Using Chinese Micro Data [J]. *International Studies of Economics*, 2024, 19(3).
- [39] Jin, X., Guo, Q., and Feldman, M. W.. Marriage Squeeze and Intergenerational Support in Contemporary Rural China [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2015, 80(2).
- [40] Jiang, J., and Zhang, C.. Parental Homes as Feathered Nets: Home-Leaving Trajectories of Young People in China [J]. *Socius: Sociological Research for A Dynamic World*, 2025, (11).
- [41] Yang, S., and Ripoll, M.. Financial Transfers from Parents to Adult Children [J]. *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 & Organization*, 2023, (208).
- [42] 王宁. 儒家经济伦理与中国经济转型——一个制度—文化耦合性的分析视角 [J]. 社会学研究, 2025, (3).
- [43] Tao, D., He, L., Hamilton, J., et al.. Children's Marriage and Parental Subjective Well-Being: Evidence from China [J]. *China Economic Review*, 2021, (70).
- [44] 肖群忠. 传统孝道的传承、弘扬与超越 [J]. 社会科学战线, 2010, (3).
- [45] 胡安宁. 老龄化背景下子女对父母的多样化支持: 观念与行为 [J]. 中国社会科学, 2017, (3).
- [46] Himawan, K. K., Bambling, M., and Edirippulige, S.. The Asian Single Profiles: Discovering Many Faces of Never Married Adults in Asia [J]. *Journal of Family Issues*, 2018, 39(14).
- [47] 周兴、刘鑫. 子女婚育年龄推迟对父母生活满意度的影响 [J]. 中国人口科学, 2022, (5).
- [48] Hay, E. L., Fingerman, K. L., and Lefkowitz, E. S.. The Worries Adult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Experience for One Another [J].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ging and Human Development*, 2008, 67(2).
- [49] Milkie, M. A., Bierman, A., and Schieman, S.. How Adult Children Influence Older Parents' Mental Health: Integrating Stress-Process and Life-Course Perspectives [J]. *Social Psychology Quarterly*, 2008, 71(1).
- [50] Cichy, K. E., Lefkowitz, E. S., Davis, E. M., et al.. "You Are Such a Disappointment!": Negative Emotions and Parents' Perceptions of Adult Children's Lack of Success [J].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13, 68(6).
- [51] Frase, R. T., Bauldry, S., Sutor, J. J., et al.. Adult Children's Education and Mothers'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Do Adult Children's Problems Mediate This Relationship? [J].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23,

78(3).

- [52] Lee, Y.. Adult Children's E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the Cognitive Trajectories of Older Parents in South Korea[J].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 2018, (209).
- [53] Ikels, C.. Settling Accounts: The Intergenerational Contract in an Age of Reform[A]. Davis, D., and Harrell, S.. *Chinese Families in the Post-Mao Era*[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 [54] Umberson, D.. Relationships between Adult Children and Their Parents: Psychological Consequences for Both Generations[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the Family*, 1992, 54(3).
- [55] Greenfield, E. A., and Marks, N. F.. Linked Lives: Adult Children's Problems and Their Parents' Psychological and Relational Well-Being[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06, 68(2).
- [56] Robins, J. M., Hernan, M. A., and Brumback, B.. Marginal Structural Models and Causal Inference in Epidemiology[J]. *Epidemiology*, 2000, 11(5).
- [57] Breen, R., Karlson, K. B., and Holm, A.. Total, Direct, and Indirect Effects in Logit and Probit Models[J]. *Sociological Methods & Research*, 2013, 42(2).
- [58] Dong, X., Ng, N., Jacobsson, L., et al.. Tying the Knot for Parents: How Adult Children's Marital Choices Impact Parental Depression in China[J]. *Innovation in Aging*, 2025, 9(5).
- [59] Xie, Y., and Zhu, H.. Do Sons or Daughters Give More Money to Parents in Urban China? [J]. *Journal of Marriage and Family*, 2009, 71(1).
- [60] 许琪. 儿子养老还是女儿养老? 基于家庭内部的比较分析[J]. *社会*, 2015, (4).
- [61] Carr, D.. The Linked Lives Principle in Life Course Studies: Classic Approaches and Contemporary Advances[A]. Alwin, D. F., Felmlee, D. H., and Kreager, D. A.. *Social Networks and the Life Course: Integrating the Development of Human Lives and Social Relational Networks*[G]. Switzerland: Springer International Publishing AG, 2018.
- [62] Yeung, W. J., and Alipio, C.. Transitioning to Adulthood in Asia: School, Work, and Family Life[J].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013, 646(1).
- [63] 贺小芹、张春泥. 从学校到工作的困难转型: 对大学毕业青年退出劳动力市场现象的研究[J]. *中国青年研究*, 2025, (1).
- [64] Cheng, S. T., and Chan, A. C. M.. Filial Piety and Psychological Well-Being in Well Older Chinese[J]. *The Journals of Gerontology, Series B: Psychological Scienc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06, 61(5).
- [65] 王阳、马小雷. 催婚: 现代社会家庭再生产的困境及其代际冲突——基于一位待婚女青年的生命历程研究[J]. *华东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4).

责任编辑: 怀明